



文学讲座教材

第一辑

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

前 言

为了帮助学员提高阅读、欣赏和创作水平，我们选编了文学讲座的部分讲稿和国内著名作家、评论家的文章，作为教材提供给学员学习参考（讲座的讲稿系根据录音整理，未经本人审阅）。

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

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日

目 录

- 1、生活与创作.....丁 玲 (1)
- 2、文艺与生活.....陈 涌 (15)
- 3、倾听着生活的声息.....王 蒙 (37)
- 4、当你拿起笔.....王 蒙 (53)
- 5、写出人民心中的春天.....李国文 (83)
- 6、谈《邻居》.....马 林 (101)
- 7、生活、目的和技巧.....高晓声 (112)
- 8、揉 面 (谈语言运用)汪曾祺 (121)

生活与创作

丁 玲

今天的社会是个万花筒，实在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多用脑筋，多想问题，起码要有一个祖国的观念，民族的观念。从事创作的人，需要老老实实，切切实实地拿出作品来。

去年夏天我在东北有的同志问我，对《苦恋》有什么意见？我说白桦有他的才华，写的作品中有好的。前年我在庐山会议上就讲过，他有首诗写得好，很爱国的。我看他的《今夜星光灿烂》，就觉得有缺点，生活不够扎实。生活一不扎实，写作时就得编凑一点，按自己感情去编，按自己主观想象去编，就会不扎实。最近韦君宜的《洗礼》，开头好象没有什么艺术性，但越看下去，感觉越好，里面的人物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人物嘛，那些人物我们见到的很多，生活就是那个样子嘛。里面写到“四人帮”时期，残酷的、黑暗的东西不比《苦恋》少。如好的记者自杀了，打人，逼供信……。但看那些东西，我们觉得并不只是消极、可怕、黑暗。我看到她描写的所谓“走资派”，我们的同志，逐步想到过去自己干的错事，认清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所以作品的题目叫《洗礼》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遭受那么多折磨的干部经历了一次洗礼，终于超脱出来了。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很多。我认识一个同志，北大荒一个农场的场长，是最早参加勘测开荒的人。崔嵬演《老兵新传》时找过他，他也是属于《老兵新传》里的老场长那么一类人吧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我们俩个一块跪在台上挨斗，斗我的时候有他，斗他的时候我陪斗。他有

一条罪名：包庇大右派丁玲。因为他说过：“丁玲嘛，老叫她劳动干什么？叫她写文章嘛，她在别的农场没有条件，到我这个农场来。”后来，我到他那个农场去了，住在招待所，给我条件，不让我自己做饭，让我写文章。他在场党委会上讲，我们对丁玲不是要她体力劳动，我们要她写文章，生活上要照顾，政治上要严格。这样如果犯错误，我来检讨。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果然有这一条，包庇右派丁玲。后来他也坐了牢。七九年他到北京来，见面第一句话，我问他：“怎么样啊？这么多年……”。他说：“什么问题也没有，一看到土地，我什么都忘了。”我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好！对。”还有一个朋友，也是在北大荒搞农垦的，是长征过来的小孩子，文革中坐了十年牢，现在是农垦局副局长。他的牢比我的牢不好坐，他在牢里窝窝头有时都吃不饱。他到北京来开会，我问他，这十年怎么样呀？他很严肃地说：“十年来党受了很大损失，我个人却有所得”。我说：“好！我们有共同语言。”韦君宜的《洗礼》就是写的这一号人。这些人不是大官。不是了不起的人，只是负一点责任。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这样一种人。这种人对党忠诚，一心跟党走，党犯错误的时候，他会不会犯错误呢？他也会犯错误，就象韦君宜小说里面写的，他们也在哪里搞大炼钢铁，搞亩产万斤，十几万斤。但是这些人从艰难挫折中锤炼出来了。锤炼出一颗更红的心。于是我就想到，有些作品，不要非去批评不可，如果有好作品（譬如《洗礼》）拿出来，就会把那个不好的作品批判了。

搞文学创作的人，是要有一点胆量。韦君宜写《洗礼》，是有胆量的。她揭露了“四人帮”时期的黑暗，也敢写老干部犯错误，但她启发人，而不仅仅是诅咒、怨恨，令人失望。影片《牧马人》的改编、导演都很好，很大胆，但

我说导演或改编的人还有点顾虑，原作中有一点最动人的地方没有放到电影上去。主人公许灵均挤在十几个人呆的一间小房子里。又冷、又臭。他受不了，躺到马棚里去，在那里还可以伸伸腰。马啃完草，把嘴伸到他那边去，带着热气，吻他，嗅他，他感到一阵温暖，我觉得这是动人的。一面虽然是冷酷无情，马却带来了这么一点温暖。既使这只是很少一点点，也可以暖到他心里去。我也被错划成过右派，对这样人感情是比较容易体会的。这个时候只要有一点点温暖，人的心思就可能大变。电影里没有写这个，写他看到拴马的绳子想去自杀，后来看到月亮，看到风景，就没有自杀。

这部影片看起来非常舒服，用电影镜头把广阔的草原显露出来，使观众心情开朗，这样的镜头很吸引观众。但是，可能编导还不能完全体会被打成右派的人的心情。那个时候，自己什么都不是了，成了一只过街老鼠，再美丽的风景与他有什么相干呀！再好的也与我无缘，我在人世只是一个丑东西啊。我曾经被国民党抓起来藏到莫干山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又一度把我藏在山西农村。我坐在那个地方的砖头上看，天真辽阔，山真美丽，老鹰自由飞翔。可我呢？没有使我开朗，只有使我想到了：我是被这个世界遗弃的人啊！我路过哈尔滨去密山，在哈尔滨我无处可走，一个人坐在黑房子里很难受，就去松花江边。正是夏天，风景很好，很多游人，可在那个地方就我的心情不好。要是有一人认出我来，我不羞愧死了。我成了一个见不得人的人，在这么一个光明世界，美丽的大地方，却难以生存啊！可是，我到了北大荒的密山，大家都在这里建设劳动。我很高兴，我可以把我的力量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劳动中去，劳动最能使人忘记自己的痛苦，我在劳动中获得了喜悦，劳动给了我欢乐，给了我安慰。在这点上，我觉得导演、改

编的人可能缺少这种体会。国外有些朋友是不了解的，他们奇怪，你干嘛养鸡呢？一个作家去养鸡，简直可笑。我说：“养鸡的人天下少了？我们中国哪一家农民不养鸡鸭子！我们有些干部过去住在农村的时候，我们在延安的时候，也都养过鸡嘛！养鸡有什么不好？小孩、病人要吃鸡蛋嘛！大家都要吃鸡蛋嘛”。劳动能给人以最美好的东西。更重要的一点，是人民群众对你的了解，给你的温暖，不是那匹马来吻你的温暖，是人民给你的温暖，人民重新给他的鉴定。这个是最有力量的。劳动者比较单纯。他看你是真劳动还是假劳动，你劳动的态度怎么样，先注意你这一点，然后再看你对人怎么样。所以，要取得人民对你的好印象，就要真真实实地在那里劳动，群众就会说你“表现好”。我觉得电影和小说都没强调这一点。但这个影片是很好的，张贤亮自己有切身的体验，有生活。生活就是那个样子，许灵均的婚姻也是那个样子。

搞创作的人要有胆识。如果创作还要看风，那成什么作家呢？那是买卖人哪！时兴大裤脚，我就赶做大裤脚卖，时兴超短裙，就赶做超短裙来卖，这是买卖人啊！作家怎能时兴什么就创作什么？不能。作家就是要写自己想写的被感动了的东西。

我认为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教育了我们一代知识分子，培养了我们一代作家，我们以后的作家还要从这篇讲话中受益，这是肯定的。但他说的有些话，我觉得不够完善。他批评“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”。我说文学就是为了爱嘛！怎么不是为了爱呢？如果你没有爱，写文章干什么？正因为你爱你才写嘛！你不爱你还写？曹雪芹就因为喜欢林黛玉，喜欢得要命，他就写《红楼梦》。尽管作者老在那里说林黛玉小气呀，多心眼呀，可是却叫你喜欢她。作者就是不喜欢薛宝钗。看《红楼梦》的人，也有恨、有爱嘛。我最

早看到的一本《红楼梦》是我舅舅家的，那上面把王熙凤、薛宝钗画像的脸都涂黑了，不晓得谁涂的，可见读者也自有爱，自有恨嘛！作家要是没有爱和恨的话，空洞地为政治而写，今天合作化，就赶快写合作化，明天搞植树运动，就写个植树，那怎么叫作家呢？怎么能写好呢？写不好的。写出来的只是宣传品，不是艺术品，是空空洞洞的东西。前两年有人说：作家是写工农兵，写群众，写自己熟悉的生活；又有人说：作家是写自己，争论不已。那有什么争头啊？那不是一体吗？作家就是要写自己，就是写自己熟悉的东西。难道他能写自己不熟悉的吗？他写别的人，里面也有他自己嘛。作品要写得好，离不开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，群众中最大量的是农民、工人，兵，如今少一点，战争时期就要强调兵。那个时候不为兵服务，战争怎么能打赢呢？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，脑力劳动嘛！这个爱还是要得嘛！作家一定要有爱。你并不爱那个英雄，你又去写他，就写得不像了。作家应该有胆量写自己所爱的，所恨的，花大力量去写。至于人家怎样评价你的作品，你不要去管它。今天不给你奖，认为你这个作品不好，有什么要紧呢？你真写得好，一万年以后，你这个小说还在，而那个得奖的，可能已经被忘记了。作家不要要求眼前的“荣华富贵”嘛。你写自己真正爱的东西，真正是为人民的，代表人民的，别的都不要去想。老想那些。实际都成了条条框框，下笔时想它，写来就困难了。这也不敢写，那也不敢写。作品写出来让它到社会上受检验。历史该怎么评就怎么说。现在有很多事一时说不清楚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有的文章还发不出去，编辑部也不敢用。但是几十年后，可能就不一样了。还是历史来检验真理，人民评说功过嘛。五十年后文章怎么写？人家就不会

完全听我们这一套了。我们的后人还是要读书的，敢用脑筋的，可以放心的。作家创作时，应该照自己的想法去写。写得好不好，要看你这个人的修养怎么样。如果你自己不是一个正派人，思想不对头，作风不对头，心灵不纯不美，你就写不出好文章。作家写作不要看风。风向常常变，自己心里没有底是不行的。作家是这样，批评家也是这样。

最近，听到有的同志说，作家又有点“怕”，现在风变了，有些文章不敢写了。自己心里没有底，只好看看这个同志怎么说的，打听那位领导怎么讲的。究竟怎么说的，怎么讲的，又都只是口头的传言。对这些传言的真实性和准确性，我是怀疑的。对那些真正百分之百正确的思想，作家自己要把它吃进去，吃透了，消化了，你才有可能也正确；如果你吃不透就去写，那很可能是夹生饭，难吃得很。

过去虽然我在延安进过马列学院，但认真读书，是在七十年代。“四人帮”把我关到监狱里，我在狱里读马列的书，自己觉得颇有所得（自然，和许多同志比，我学习得很差）。七九年我回到北京，曾向一些同志推荐，我说你们别的书不读，马列的书一定要读。马恩全集，一年读几本，花个十数年，下苦功把它读完，会有兴趣的，会有所悟的。但有人说，这书现在不时兴，过时了。我对他们讲，要读最好的文学书，文学书里面有人物嘛！如果《红楼梦》里没有林黛玉这些人物，有什么读头？光是大观园，花、草、树、木，有什么读头？马恩全集里面也有人嘛！有两个了不起的人，有最可爱的人——马克思、恩格斯。现在哪里有这样的人啊！也是可以当文学书去读的，是会受益的。

不读书，没有比较，没有鉴别，心里没有底呀！要读马列主义，要读《讲话》，哪些地方我们仍要坚持下去，哪些

地方可以有所补充发展。比如说：“政治第一”。我说一个文学作品嘛，当然应该是艺术第一，首先是文学，是艺术品，怎么能是政治第一呢？政治第一是要求报纸的社论，政党的宣言，政府的法令。文学当然应是艺术第一。但是，你这个文学有艺术性，没有政治（所谓政治是广义的，不是临时的政策、运动），就是没有思想性，或者思想性不高，甚至会起反作用，这样的作品就没有价值。如果作品的思想内容不好，但艺术的手法很好，那么这样的作品对人民就具有更大的欺骗性。现在我们也有这样的作品，艺术性看来很好，表面上也没有反对共产党，但是里面的东西却坏。你们搞编辑，开展批评，就得在这上面花脑筋，要多看书，要有比较，要多思考，要有主张。光讲马列主义也不行，还要了解我们这个社会。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鲁迅著作，都帮助我们了解社会。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社会，不懂得这个社会，讲的话便都是空的，都是脱离群众的。作家写工人吧，工人也要接触许多人的，不能写那个工人只在那个工厂啊！他的家庭，他周围的环境，他的老师，他的工友，他恋爱的对象，都得写啊，都得懂啊。一定要先了解我们这个社会。搞创作，和搞评论的人还得要懂别人写的小说，懂得人家的创作。在这一方面，我们很多人都不太够。

去年，全国短篇小说评奖，送给我的稿子我只看了一半，另一半实在没有时间看。那次评选得奖的约有二、三十篇。但这些篇是从多少篇中筛选出来的？我想至少我应该看两、三百篇，才能有所比较，才能心里有数，才敢于参加讨论，说那些实在是好，应该评奖。但我没能做到，心中是有愧的。对于批评家，我想也得这样。批评家读作品不是去挑眼的，批评家对作品要有感情，爱或恨，要爱护作家。如果不能这样，最好不去说话；不完全了解作品，就不要随便批

评。批评要十分注意分寸，过犹不及，放弃批评不好，过头了也不好。现在有的批评文章过火了，有的动不动先给人家戴帽子。帽子戴上了，有两个结果：一个是使读者反感，经过十年浩劫，伤痛犹存，读者第一个想法就是“姚文元、梁效又来了”。也许你的文章里面有正确的东西，但读者不接受，不喜欢那个态度。第二个结果是，本来是应该批评的，有的人也愿意写点文章，提意见。但是一看帽子飞来了，他就不写了，怕被读者看成也是去打棍子的。批评家要真正吃透自己要想评论的作品，心里完全懂得了，拿准了，又有感情，压制不住，如果不说，就要憋死了，非讲不可，那就讲吧。讲错了负责，我承认。不可能要求自己每篇评论文章都百分之百的正确，以为自己是权威。我一说好，别人就都说好了，自己千万不要这么想，人总是会有错的。写文章可以逐步提高，要提高就得多写。但有一条，过去写错了的文章，不要不认帐，甚至一心想混帐，赖帐，那就不对。现在有的人把过去的文章收集起来出书，竟要大改自己过去的文章。这又何必呢？出集子，是让后人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发展过程，你的思想是怎么产生的，怎么变化的。现在修改，就违反了历史。听说为陈云同志编文集时（这个不是假的），曾向他请示，把有一段话里的“英明领袖华主席”这几个字删掉，陈云同志不同意。说我那个时候是那么想的，那么讲的，不要改。这种态度令人佩服。很值得我们学习。很多人，也是这样，保存历史的真面目。有些同志改动自己的旧作，把不太革命的改得革命一点，把不太合乎马克思主义的，改得马克思主义一点。有的改了，听到一点批评，又把它改回来，改来改去，没完没了。老想把自己装扮成圣人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你写作品到底是为了自己，还是为了人民呀？

最近一些日子，我回顾了一下我们在延安编的《解放日报》文艺栏。从我接手开始一直到我离开，这段期间的文艺版面我大致浏览一遍。七十年代末有人说我是延安写黑暗的倡议者，是写黑暗派的头子，至今也没有听到有什么更正，所以我要看看那个时候到底倡议了什么，写了什么。我发现这个文艺栏编的真死板，这期登一篇小说、一首诗或一篇翻译作品，下一期又是这样。因为它编的死板，读者有意见，说编的太死了，一点时代感都没有，好象是读旧报纸一样。于是，我就组织了几篇批评性的文章。我自己写了一篇，林默涵写了一篇，是我动员的，批评重庆的梁实秋、胡秋原。看了这两篇文章，有人又提意见，而且是中央的一位同志给我提的，说你们这个炮打得太远了，打到那个地方，石沉大海，人家看不看得见你这个报纸哟！于是我想，那就打近一点吧，这样罗烽同志写了两篇，现在我都看不懂他到底说的是什么人，什么事，太朦胧了。另外有几篇态度比较明显。

最引人注意的就是《三八节有感》，我重读了一下这篇文章，觉得还有味道。我是为两个女同志打抱不平。那时她们正面临离婚的厄运，我想她们都还在，还记得。我说了几句，老干部离婚，把土包子老婆丢了，另外找新的，表示不平。文章讽刺了江青。“一个星期跳一次卫生舞非常好”，就是江青说的。没想到这会招来什么后果。我为被离弃的两个女同志抱不平，但别的闹离婚的同志都会以为我是说他们，自动对号入座，那就得罪了更多的人。也会得罪一些“太太们”。我现在也承认我那文章有不妥之处，不必那样写。那时更没有想到敌人会拿去利用。就象现在我们有些人的文章受到台湾的好评、转载一样。《野百合花》，我先看过，也考虑这篇文章不太好。只想发上半篇，下半篇就不发

了。后来发稿时我已经离开《解放日报》了。有人说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为这两篇文章开的，很多人问我，写文学史的人也来问我。我以为不能那么说。毛主席是个伟大的政治家，是全党的领袖。他能够仅仅因为这一两篇文章就召开了那么空前规模的文艺大会吗？他作的引言、结论里面，说了立场问题，方法问题，态度问题，宗派主义问题，普及与提高问题，关门提高问题等等，都是一般性的，都值得自己学习、检查。但是如果把这些问题只归结于只是针对某几篇文章、某几个作者，那未免把《讲话》的普遍教育意义降低了。党中央要开文艺座谈会，毛主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是早在思想里酝酿着的问题。自然，我可以检查，是否由于我的《三八节有感》触发了他，引起他对文艺问题更加重视。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解决了文艺工作者的一个主要问题——立场问题，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。《讲话》是提高认识，解决思想问题的有力武器，从来不是棍子。《讲话》发表以来，文艺界有过几次大的运动，有成功经验，也有惨痛的教训，我们要认真总结，但无论如何，不应总结出一个“怕”字，甚至要全盘否定《讲话》。

《我们需要杂文》这篇文章，现在收集到我的文艺论文集去了。大家如果有时间，欢迎你们看看，给我提些意见，我自己实在看不出什么问题，看不出有提倡暴露黑暗的嫌疑。去年在吉林召开的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我讲，我们现在还需要杂文。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问题，小说太慢了。杂文较快，可以短兵相接。

我们需要解放思想，作者敢写，编辑敢编，但是应有个限度，这就是社会主义，就是我们党中央再三强调的“四个坚持”。在美国有人和我说“你们不自由”，我说：“我们国

家的整个文艺创作是自由的，但是有个限度，在限度之内可以自由，得到保护，受到赞扬。出了这个限度，就可能挨批评，因为别人有百家争鸣的自由，有批评的自由。绝对的自由哪里都没有。美国也没有，”前些日子《人民日报》转载了我写的《海伦的镜子》。斯诺的前夫人海伦·福斯特·斯诺见到我时说：你是不自由的，那是因为政治问题；我现在不自由，是因为经济问题，没有钱。她写有三十几本书，美国出版商对这些书毫无兴趣，不给出版。她就没有出版的自由。我们中国是有个圈圈，这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。在圈圈里可以自由，出了圈圈就不自由，人民要干涉，党也要干涉。编辑工作也有个圈圈，完全的解放，绝对的自由，是行不通的。怎么能做到又解放，又自由呢？我想就是要你真正吃透马列主义，吃透这个社会，吃透党的政策，就会有更大的自由了。

谈谈我在美国看到的文学方面的和其它的一些情况。美国很大，工业先进。但没有一部纯文学杂志，再好的小说也只在综合性的刊物上放在后面。刊物销路最多最受欢迎的还是黄色书刊。有一家出版商要出我的书，说一版印五千册。能给多少稿费？算了一下，廿多万字的一本书卖20元，每本抽百分之十五的版税，就是三块钱。卖一本算一本，五千本全卖了，可以给一万五千块钱。一年两次，分期结帐，分期付款。把五千册销完，大约要几年。某个铸造厂的工人，一小时拿九到十五块钱（这是比较高的），如按十块算，一天可收入八十块，一个月做廿天就收入一千六百块，一年将近二万块。作家的收入比一个工人的工资还差那么多。美国的科学发达，文化水平高。但文学在他们那里不怎么重视，作家也没有什么希奇。中国的作家不一样，国家重视，人民欢迎。作家写作、生活都有保障，还可以到外地讲学，介绍创

作经验，可以参观游览，对年轻作家也是这样，而外国却没有那回事。资本主义社会看重钱，没有钱，什么都不行。有个人研究中国文学，写了一本研究丁玲的书，得了文学博士。但是找不到工作，只好在图书馆管图书。看来在美国进大学是容易的，只要你有钱，有中学文凭就收。但进大学后却不容易了，要真用功，下苦功才能读到大学毕业，如果得不到学位，找工作是很难的。所以为了得博士，为了毕业，大学生紧张得很。在美国生活，房子、汽车都是私人的，买不起，可以分期付款。一年中挣的钱，扣去国家的、地方的各种名目的税款及各项开支，就只剩下吃饭的钱。有人说美国人比较小气，我看，大方人当然还是有，但多数人都是量入为出，花钱精打细算，他没办法大方。要是大方，房子就没有了。不交赎购的房钱，几年的钱就白交了，房子也得没收。美国人又有汽车，又有房子，但实际上他们余钱不多，生活很俭朴，到廿五年以后，房子归他了，人已五十多岁了，忙了一辈子就忙这个东西，为房子、汽车当奴隶。有的人连老婆不敢要。相好了，俩个人住在一起，不好了俩个人分手，不用拿离婚费，不用分家产。很多年轻人也不要孩子，很多家没有孩子。我太同情他们了，他们一辈子当奴隶，当到老，连个老婆都没有，没有家，老了就住养老院。在美国没有很多人读文学书，就是看电视。在美国有人问我：“你们的人读不读书？”我向他们讲，我们全国有四、五百种纯文学刊物，这不是精确统计。文学刊物每个省都有一个厚的，两个薄的，销路从几十万到一百多万，买书的人的工资，大多是月薪四、五十，六十块钱，每个月拿三、四块钱去买文学书刊。他们听了很惊奇，有那么多刊物，拥有那么的读者。我问他们读不读莎士比亚的作品，他们说：那是少数搞文学的专家们读的，大多数人只看

电视。美国的电视，放一个电影，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插进各种广告，什么蛋糕好吃，到哪去买，怎么做的……。我说你们教育人怎么吃，怎么穿，女人怎么打扮。这不也是一种“洗脑”吗？

美国的文学艺术究竟是什么样子！我看到的很少，虽然翻译的有一部分，我也看的不多，不敢随便说。作家的作品，斯坦贝克、马克·吐温、辛克莱、德莱塞……，这些作家我们是熟知的、尊重的。至于现代的作家，可以说，彼此都有交朋友的愿望，但实际了解不多、不深。

这次在美国，看到一部西德拍的影片。据说，在美国风行一时，并且得过什么一等奖。影片的名字叫《锡鼓》，是同名小说改编的。原作我没有看，据说是一本畅销书。从电影来看，作家似乎也还是有思想的，他想要暴露这个乌七八糟的社会。但是影片那么表现，吸引那么多人喜欢看，到底是看作者的思想，还是看那些露骨的黄色镜头？同外国一些作家坐在一起，简单的交谈，他们不少人都喜欢这些玩艺，要和他们说什么“思想性”，他们会奇怪，认为中国作家不能写“性”，太不自由了。另外我看了百老汇剧团到爱荷华城来演出一个歌舞剧，描写一个舞蹈的导演招收八名新演员，有十六个男女青年来报名应试，这十六个人分别在台上动胳膊踢腿，有说有唱，讲自己为什么来学舞蹈，介绍自己的家庭，自己的朋友，自己的爱好等等，有的还说自己也是同性恋者……。因为语言幽默，朗诵节奏感强，常常得到台下的哄堂大笑，可惜不懂英语，但观众的反映热烈。这里面没有黄色的东西，不是暴露黑暗，也没有歌颂光明，大概就是让观众高兴，把看戏当成有趣的事。这也应当是可取的。在某些酒会里，有人跳“迪斯科”，这本来是健康的黑人舞蹈，但现在被资本主义化了，尽情享乐，放荡丑陋，“化”得叫人看起来不舒服。

对“黑社会”，我也曾投以一瞥，在旧金山的一个夜晚我乘汽车在马路上慢慢行走，朦胧灯光下，路两边站的妓女，跟旧社会的上海四马路一样，四马路的妓女后面有老鸽子看着，这里离妓女不远便有两三个保镖似的打手。朋友还指点我们看待立在路边的还有妓男。至于脱衣舞，性影片，大小城市都有，那是合法的。

欧美有些国家兴起女权运动，有人问我中国有没有女权运动？我告诉他们，在社会主义中国，基本上已经是男女平等，但在思想意识上，男女不平等的封建残余还比较严重。有个住过中国的加拿大的女记者说：“你说中国男女平等，不对。你们那里有四十岁离婚的人，男的可以找爱人再结婚，女的就找不着了，而且大家还看不起她。”我告诉她，离婚后男方容易找到爱人，女的比较不容易，可能有这样的事实。但社会上不是看不起她，而是更多同情她。社会上也会有被看不起的女人，那就是乱七八糟的乱搞男女关系的，把这种人叫“破鞋”。

我在美国四个月，对美国了解得不多、不深，但总算有了一点认识。我接触了一些美国朋友，他们非常友好，愿意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，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。但也有少数人，他们对我此行失望了，他们挖苦我。咒骂我。在洛杉矶我看到一篇这样的文章，在香港又看到两三篇。我觉得好笑。台湾出版的一张报纸上的题目是《从莎菲到杜晚香》，论证我现在被共产党打得不象样了，打趴下了，再打我也要夸共产党好了。还有一篇题目是《太阳照在干了的河上》。桑乾河干了，没东西了。对这些，我都报之一笑，反共分子越骂我，我越来劲。一犬吠影，百犬吠声。反共分子的叫嚣，我们大家都听惯了有什么了不起呢！我就这个样子，继续走我们自己的路。

（根据录音整理，未经本人审阅）